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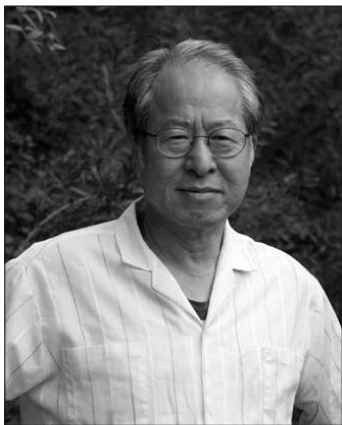
## 摇篮

○王克斌（1970工物）

1964年7月我考上了清华工程物理系。8月底，北京地区录取的新生提前进校，参加接待外地新生工作，叫“以新迎新”。

当时，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是5年制，少数4年制，清华特殊，规定6年制。我们应于1970年毕业，故称作物0，即工物系0字班。物0年级招了大约150人，分5个班，我们是第4班，班号物04班。物04全班和部分物05班同学在高中时是学英语的，其他三个班高中时学的都是俄语，入学后改学英语。由于工物系学生需要面对放射性工作，因而学生中大部分是男性，女生不到10%，全部集中在物05班。开学前，首先要经过体格检查。我发现，我的视力从高二时的1.5降到了0.6，另外，还有一颗蛀牙。其他项目倒还及格。那时，课程由学校统一安排，没有选课一说。第一学期的科目有高等数学、普通化学、画法几何与工程画（机械制图）、政治和体育。第二学期，普通化学结束，换成普通物理。

工物系宿舍在5号楼，每间屋住6个人，三张双层床，中间是一张大桌子，供6人学习使用。我们班共有30个人，班上40%来自工农家庭，四五个来自革命干部家庭，其余为高级知识分子或职员。虽然来自五湖四海，并且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



王克斌学长

和经济状况，但大家能够友好相处，相互帮助。后来在文革中，班上分成两派，但同学间没有多大敌对情绪，这在当时的确很难得。另外，不管是来自富有家庭，还是来自贫困家庭，相互间能一视同仁，没有过因富笑贫和以强凌弱的事情。穷也好，富也好，都能做到艰苦朴素。工物系用膳在离5号楼较近的第十饭厅。1964年，经济已经好转，清华的伙食办得较好，隔三岔五地能吃上红烧肉、排骨和带鱼。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父亲乘公共汽车来看我。我把自行车交给父亲，让他骑车回去，我沿着铁道走向城里（家在北京城东南距离清华约20公里），到家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。

那时候，高等院校都属公立，学生不需要交学费、杂费以及住宿费，唯一的用项就是吃饭和买书。清华大学，原则上伙食费用由学生自己出，但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。我们班工农子弟多，有十多个人都享有助学金，最高19.5元。我家四口人靠父亲的30元退休金和姐姐的32元工资过活，也算是低收入家庭，每月我有15.5元助学金补贴，正好够一个

月的伙食费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。感谢新中国和社会主义，给了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。学生享有100%的公费医疗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连挂号费都不用交，只要出示学生证就行了。我只去过两次校医院，一次是接到通知，让我前去补牙。另一次是领了一瓶酒石酸钾钠脚气药。补牙的质量很好，40多年来，从未脱落过。

工程物理系是机要系，当时在全校取分最高。工物系1956年建系，系主任由校党委副书记、教务处处长何东昌兼任。第一届是从其他各系挑选的品学兼优的学生，进入工物系三年级，于1958年毕业，称为“物8”班。

为了争取全面发展，我报名参加了70届新生运动会，中长跑400米，成绩是第10名，1分0.3秒，可惜，距离代表队的成绩还差10多秒，无缘进入。我还报名参加了门槛较高的清华音乐室的弦乐班考试。音乐室在校园的西北角，化学馆的西边，是一座青砖小楼。有管乐队和弦乐队。管乐队里有铜管和木管，老师是周乃森。弦乐队主要是提琴，老师是陆以循老先生。陆老先生亲自监考，先是面试，然后要唱一首歌。我当时最喜欢的歌是吕文科的《我为宝岛献青春》，“天上飘着朵朵白云，地上跑着团团牧群”，唱了两段。然后是笔试，把一段五线谱译成简谱。我通过了这些考试并且分配到小提琴班。在第一次上课时，陆先生重点强调了小提琴是个细线条的艺术，一定要重视基本功，下苦功夫。然后，按规定的几个下午在音乐室的隔音房间按照练习曲练琴。有一天，我一遍一遍地拉着7 $\dot{1}$ 7 $\dot{1}$ 2 $\dot{3}$ 2、1 $\dot{7}$ 1 $\dot{7}$ 1535，

有点烦了，就脱离乐谱，拉了段白毛女。陆先生听到后，严厉地批评了我，“如果离开练习曲，去拉小曲儿，就学不好小提琴。”于是我又回到了练习曲中。开学后，功课逐渐加重，团支委的社会工作又占去了许多的时间，我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停止了音乐室的活动。后来，陆先生让焊9的一个拉中提琴的同学来找过我几次，我一直没有回去。现在想起有些后悔，陆先生提琴造诣很深，我若坚持两年，至少可以演奏《新疆之春》这首曲子了。一个人的一生中，总免不了几次遗憾。

新生入学后要经过多项入学教育。我们到大礼堂听过马约翰教授的报告，马老是中国体育界的元老，曾经率队参加1936年的奥运会。马老给我们作报告时已经82岁，腰板挺直，精神矍铄。他一年四季，都穿着短裤，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活动。他的报告宗旨就是让大家树立锻炼身体的良好风气。他说他从来没得过病，什么感冒，流鼻涕，没有那回事，大家深受启发，把锻炼身体放在首位，响应蒋南翔校长提出的号召，“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”。

另一项是校史教育，到图书馆参观展览。从纪念闻一多的闻亭，到纪念施滉烈士的壁碑，了解了清华的优秀革命传统。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历史资料是关于反右斗争的。工物系的物8班是由各系的优秀学生选拔组成，本来是清华的希望，没想到在反右斗争中几乎全军覆没，对工物系学生是个严酷的教训。展览还为我们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榜样，年轻的优秀党员吕应中，他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了量子力学讲

## □ 我与清华

义，还设计并建成了清华自己的轻水型核反应堆。还有一张邓小平同志作关于反右报告的照片。校史展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，不能光顾学习，还得注意政治方向。

还有一个重要的入学教育就是“三自”活动，即自己暴露问题，自己分析问题，自己解决问题，不打棍子，不抓辫子。主要是围绕学习目的、动机，在班会上讲出自己的一些错误思想。如工农子弟中有不少存在着报答父母，改变家庭困难的观念。也有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报恩思想。在政治老师的循循善诱的引导下，逐渐认识到个人思想的片面与错误，从而树立正确的为祖国学习的目的。

第一年的课程安排和进度不算紧张，内容全新又消耗时间的要数“画法几何及工程画”课，难度较高的是相贯体。工物系的学生要用一年半来学制图课，在清华，算是比较长的了。后来，制图的技能还真派上了用场。80年代，我在做论文时，需要设计一个没有透缝的密合铅室，用来屏蔽高纯锗探测器。我画好后，同组的人说是迷宫。实验室的技术人员，把设计晒成蓝图，制成模具，最后用铅水浇制出来。

清华学生有两大特点，即生活上艰苦朴素，学习上努力刻苦。60年代，清华园里云集着不少高干子弟，这些高干子弟在穿戴上和普通同学没有多大区别，而且，同在一个食堂，围着一张桌子，站着吃饭，很少见有人大吃大喝比阔气。更可贵的是，他们都是凭借着考分选进来的，周末也见不到小汽车来接孩子。至于工农子弟，家庭本来就贫困，不少学生连件衬衫

都没有。我在大学6年里，就从来没穿过衬衫。两条短裤，两个圆领背心，陪我度过了6个夏天。班里有把推子，大部分同学都不去外边理发，在周末相互剪头发。有位海南的同学，入学时只带了一领凉席，被褥都是由学校帮着解决的，由于气候不同，每到冬天，都冻得手脚生疮，他还是坚持了六年，直到毕业。每天晚饭后，只有两个去处，一是扛着丁字尺，拿着三角板到新水利馆去画图，另一个则是背着书包到大图书馆去看书，做作业。图书馆在开门以前，已有数百人排队等候，来晚了，可能就没有座位了。

清华当时有规定，学生在第一年结束前要参加一个月的军训。1965年5月，我们物0的学生步行到位于昌平的解放军第三工程兵学校去学军。那时，同学间能互相帮助，我用的薄被、手电和草帽都是从8字班和9字班同学中借的。因为是借的，所以格外爱惜。行军中，我忽然发现草帽丢了，于是要去找寻，身后的同学告诉我，草帽没丢，就挂在我的后背上，让我虚惊一场。步行大约5个小时，到了三工校。营房很大，有两排地铺，宽敞明亮。连长、指导员和排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。副排长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阎承志，阎淮和我担任班长。班长配备一支冲锋枪，战士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。因为是工兵学校，爆破技术必不可少。学习爆破时，我们每人发一块200克TNT炸药，在一个小土坡前列成一排，听口令一起用火柴引爆。大概由于听到别人的导火索燃烧的可怕的嘶嘶声，我的第一根火柴没有点着，于是又划了第二根点燃了导火索。然后，退下坡去，接下来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训

练还采取了野营的训练方式。头一天晚上是在一个山间的小树林里度过的。地上燃起了篝火，大家听排长讲故事。因为夜间寒冷，排长嘱咐大家千万不能睡着，睡着了容易受凉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们在老乡家借宿，由于用不好柴灶，饭未按时煮熟。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们的房顶上又出现了炊烟，排长发现，严厉地批评了我们，这缕违纪的炊烟断送了我们争当四好班的机会。我们到山里访贫问苦，听了一位贫农老大爷讲抗日的故事。第三天拂晓，行军队伍靠近十三陵时，在一个两面是山，中间是口袋状的山谷，安排了一场伏击战。我们事先在山坡上埋伏好，等待“敌人”进来，排长一声令下，冲锋枪、步枪一阵猛射。伏击结束后，大家一起到十三陵水库游泳。在工程师的摇篮里苦学一年后，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，也是难得，值得回味。

1965年开学，迎来了“文革”前最后一批大学生，他们这届的学制改为5年，也在1970毕业，为了区分我们这届0字班，他们那届被称作00字班。这一年，为了落实毛主席“73 指示”，学校开始减轻学生负担，并且规定晚上按时熄灯，保证8小时睡眠。那一年，有两次报告印象较深。一个是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的报告，注重业务领域，中心内容是中国与西方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差距。另一个是蒋校长在东大操场的报告，里边提出了清华大船的概念，而且要开顶风船。当时我很纳闷，为什么要顶风，顶什么风，弄不明白。

1965年11月，姚文元一篇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文章，奏响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序曲。说它是学术研究也好，

还是政治斗争也好，大部分同学都不大敏感，依旧沉湎于数学、物理的学海之中，没有意识到一场严酷持久的风暴就要来临。按学校规定，第二学年末，学生要参加金工实习，在清华机械厂学车工、钳工等课程。随着“文化革命”紧锣密鼓地逼近，《人民日报》又开启了对“三家村”的批判。1966年5月中，又发表了声讨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檄文《516通知》。清华领导班子渐趋瘫痪，北京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，不得不停课闹革命，一个个跳出了工程师的摇篮，以各种方式投身到“文化革命”的大风大浪中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旷日持久的运动到1976年才划上句号。这一代学人连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跟“文化革命”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浪费掉数年宝贵的青春。不过，“文革”前两年的在校学习还是为我们后来各自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、坚实的基础，时间虽短，但影响深远。

那两年，我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，没有争执，没有冲突，和谐安然。我不记得同学们一起听过戏、看过电影；我不记得同学们一起爬过香山、逛过颐和园；我不记得同学们一起到某个饭店喝过酒、用过餐。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，生怕有半点遗漏。我们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学业上，别无他念。我们满足于一个月15块钱的伙食，我们满足于俭朴甚至破旧的衣衫。那是一池平静清澈的春水，那是一个促人成才的摇篮。那样的日子值得我们回忆、留恋。抚今思昔，感慨万千。感谢母校清华发给我们的猎枪和子弹，让我们后来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里，自强不息，勤奋上进，把青春奉献。